

走过的世界

程极明 著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走过的世界

程极明 著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走过的世界/程极明著. —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8.1
ISBN 978-7-5004-6457-0

I. 走… II. 程… III. 回忆录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58691 号

选题策划 雁 声
责任编辑 骆 珊
责任校对 韩天炜
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
版式设计 木 子

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

电 话 010—84029450(邮购)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

装 订 丰华装订厂
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1/32

印 张 5.25

插 页 2

字 数 124 千字

印 数 1—3000 册

定 价 14.8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程极明，1929年6月生于南京。1946年4月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47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上海学联工作，后在上海团市委任上海高等学校团委副书记。1955—1965年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，其中1955—1958年任中国学联驻国际学联代表、国际学联书记处书记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任情报研究所所长及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，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原副会长、现顾问。先后出版了5本专著、7本编著，发表了一批论文。2005年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南京和上海地下党和学生运动的小说《洪流》（35万字）。

选题策划：雁 声

责任编辑：骆 珊

封面设计： 大禹工作室
81574848



作者夫妇在捷克斯洛伐克塔塔那山上，1957年



作者夫妇和子女，2005年4月

前 言

由于工作的需要，我曾有机会出国访问了四十几个国家和地区。先是在 20 世纪 50—60 年代，我有幸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，在国际学联担任过中国学联驻会代表、国际学联书记处书记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不多。所以，当时群众组织的外事活动，曾起了相当的开拓作用，我也由此交了不少国际朋友。“文革”以后，我从事世界经济研究工作，也有机会去国外参加学术会议或作为访问学者做一些研究工作。我有机会到世界各国访问，增长了许多知识，有一些肤浅的体会。这些感性的知识，有助于我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。现在年纪老了，根据我的记忆，把我的一些印象和感想写出来。虽然时隔多年，世界飞速发展与变化，许多事物已不可与当年同日而语，但我经历过的点点滴滴，也许可以提供给读者一些有关各国的信息，使他们产生一些兴趣，了解一些历史。如果他们愿意把拙作看下去，那就谢天谢地了。

这本书，是我儿子以青建议写的。能写出来，得感谢他，也感谢其他鼓励我写作、并对我初稿提出修改意见的亲友。我的好友武振平同志代我取了书名，我衷心感谢他。此书得以出版，也十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编审黄燕生同志的热情帮助。

程极明
2007 年 9 月

目 录

前言	1
一 初出国门	1
1. 路过苏联	1
2. 从莫斯科到布拉格	6
3. 在英伦三岛	11
4. 北国风光	14
二 在国际学联工作	18
1. 美人鱼的家乡	19
2. 尖锐的斗争	22
3. 参加亚非学生会议	33
4. 与亚非朋友的交往	37
5. 忆贝利康	47
6. 我的第二祖国	61
7. 永远怀念曹老	68
8. 东欧杂忆	72
三 茫茫非洲大地	90
1. 初到北非和西非	90
2. 去伦敦买有关非洲的书	100
3. 访问阿尔及利亚、西非和东非	101
四 勤奋的日本	119
1. 发达的市场经济	119
2. 惊人的效率	124

3. 少有的勤奋	126
4. 实实在在	128
5. 精益求精	130
6. “日中不再战!”	132
五 古老而又现代化的意大利	137
1. 文明古国	137
2. 相似乃尔	142
3. 乱与治	144
4. 团结与分裂	146
六 发达的美国	150
1. 高度、全面、较均衡发达	152
2. 开拓求实	155
3. 铜币反面	157
4. 市场经济体制	159

一 初出国门

1. 路过苏联

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以后，我开始在上海学联工作，担任组织部长，主要的任务是在各大学和中学里帮助建立学生会。到了11月，我被调到上海团市委学生部，搞高等学校的建团工作。记得上海当时有16所高等学校，2万名大学生，我们在其中发展了1万名团员，建立了16个校团委。

1950年初，我带领一个工作组到复旦大学蹲点，并由虹口区委任我兼任复旦大学党总支副书记，和当时的书记邹剑秋同志一起工作。

到了12月，我们正忙于总结一年的工作，研究第二年的计划。一天下午，学生部的秘书木青突然来了个紧急电话，要我立刻回机关，说有重要任务，并要我把工作完全移交。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就匆匆赶回陕西南路5号。到了部里，木青偷偷告诉我，要我晚上乘火车去北京，出访英国。她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。我的脑子里满是复旦的工作，对于出国，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。

后来，学生部部长钱李仁同志告诉我，应英国学联的邀请，

全国学联要派一个代表团去英国访问。第二天有中央同志接见，所以当晚必须动身。他说，一切事情到了北京就会知道了。

晚上我上了火车，因为平时工作很疲累，很快就睡着了。

北京的冬天很冷。我从来没有在北方的冬日生活过，只穿了一身上海干部服的棉衣棉裤。没有大衣，在北京就显得很单薄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享受有暖气的生活，屋里屋外俨然是两个世界，和上海有很大的不同。我基本上躲在屋子里，尽量少出去。

原来是刘少奇同志要接见我们代表团。但是，他突然又有了什么事，不能接见了，让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同志接见我们。我们就等着安排。

我和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郭琨同志同住一屋。他就是后来去南极考察的第一任队长。我们两人同年，都才22岁。我们一起参加代表团的准备工作。原来要立刻去英国的，但是中国学联驻国际学联代表柯在铄同志传来的消息说，英国学联很狡猾，请我们12月去，正好是圣诞节和寒假，根本见不到大学生，还是推迟去为好。我们代表团就决定年底再动身。我向团长袁永熙同志提出，是不是让我回上海一个月再到北京来。他笑了笑说：“你就在北京住下来，边准备，边休息，不是挺好吗？”

分给我的任务是起草和英国大学生见面时的发言稿。稿子只要讲五分钟的。我很快就起草好了。然后就是看材料，听一些去过英国的同志介绍情况和体会。我和郭琨也没有什么事情干，就去团中央图书馆借《克里姆·萨姆金的一生》等一批高尔基的长篇小说看。那是一些平时想看而没有时间看的厚书。我们每天看到夜里12点才入睡。暖气那么足，我们早晨就睡懒觉。这么过了二十几天，不知不觉地把我自解放以来得的神经衰弱症医治好了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我们工作忙得不得了。每天晚上总要忙到下半夜。许多同志学会了抽烟，我就不断地喝茶。几乎每个月，

我都要发一次高烧，需要睡上一两天。平时晚上睡不着，天快亮了，又特想睡。这下子，用“睡眠疗法”把我的毛病治好了。真得感谢英国学联的心机。

代表团由6人组成，袁永熙同志是团长，他是团中央学生工作部的负责人，新中国成立前是北平地下党学委负责人。团员除了郭琨和我以外，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会副主席管平（女），以及我国学联驻国际学联的代表柯在铄同志，他在布拉格等我们。翻译是曾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、当时北京外语学院当教授的程镇球同志，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大翻译。

我们在12月下旬乘苏联民航的伊尔12型飞机去莫斯科。那是一种两个涡轮引擎的飞机，可以飞3000公尺以上，但是因为带的油料不多，只能连续飞行3小时，所以，我们断断续续走了六七天，才到达莫斯科。途经机场的候机厅，经常听到有关坏天气的报道。到任何一个飞机场，都是白皑皑的一片。对于我这个生于南方的青年来说，太有趣了，整个世界似乎是座大雪宫。我们经过了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，苏联的伊尔库茨克、鄂姆斯克、克拉斯诺雅尔斯克、新西伯利亚以及喀山。

从乌兰巴托的机场到城里，汽车开了一个多小时，公路的两边全是草原，一望无际。到了市中心也只有几个大建筑。中央是蒙古革命领袖乔巴山的墓，左边是国家大饭店，右边是部长会议大厦和乔巴山大学。再没有其他的大建筑了。当时蒙古首都的人口是八万人，其中华侨有一两万人。在乌兰巴托的周围，大都是蒙古包。革命胜利已经几十年了，却没有什麼大变化。给我们吃的是羊肉和羊奶，我们很不习惯。

第二天，飞到伊尔库茨克。我第一次领略到西伯利亚的寒冷。我们穿的是绒线衣裤、外呢子中山装，加呢子大衣，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下，好像身上没有穿什麼衣服一样。冷风吹在脸

上，好像被刀子割了一般地疼痛。我们迅速地跑进候机室，才喘过气来。到了屋里，就有一种特殊的气味，烟草的、洋葱的、女人香水的，又混合着伏特加酒的味道……我们后来称之为“俄罗斯气味”。由于空气不大流通，所以气味散不出去。候机室里放着悠然动听的音乐，使人顿感轻松。哦，这就是我们向往已久的苏联！

接着，我们在漫漫的似乎是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的大草原上翱翔。到处都是大片的白桦林，到处都是漫漫的雪海。我们不禁唱起苏联的《祖国进行曲》：“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，到处都是田野和森林……”

在伊尔库茨克和喀山，特别是喀山，那里的城市还保留着革命前的模样。在喀山的旅馆里，那位掌柜的老头，带着旧式的夹鼻眼镜，拿着俄式竖直的算盘，看上去十分有趣。在喀山大学前，我仿佛看到列宁在那里上学，又仿佛看到曾是流浪汉的高尔基在那里卖面包。有轨电车好像还是革命前建成的，丁丁当当地在城市中奔跑。哦！那正是高尔基描写过的俄罗斯。

其他几个城市就不一样了，它们是在战争中和战后新建立的工业城市。特别在新西伯利亚，许多建筑是崭新的，非常漂亮。旅馆里的设备也很好，只不过厕所里的手纸用的却是裁好的《真理报》，无法使用，大杀风景。这也反映了苏联轻工业的落后。苏联的森林那么多，用木材造一些高级的手纸，本应是轻而易举的事。

每到一个飞机场，最使我感动的是在候机室门前都有一组雕像，是苏联著名的雕塑家雕塑的列宁和斯大林的像。列宁坐在公园的长椅子上，斯大林站在旁边，似乎在聆听列宁的谈话。一下飞机，就看到他们。越走越近，好像听到他们在说俄语。我们兴奋极了。他们在这寒冷的冬日，在等候远方的客人踏上俄罗斯的

土地，欢迎新中国的学生们。他们太辛苦了。

到每一个飞机场，使我们十分震惊的是机场上排列着一大排双引擎的飞机，一望无边，看不到头。那时是卫国战争刚结束后几年。仅在1944年那一年，苏联就生产了9万架飞机。没有那么强大的国防工业，怎么能打败德国法西斯呢？苏联在革命胜利后，执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，拯救了他们的祖国。而那时，我国的空军刚刚建立，还不会生产飞机。这种状况对我们是极大的启发和鼓舞。我们想，什么时候我们也建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呢！

沿途见到的苏联人民，都对我们十分友好。苏联民航每到一地，就主动通知当地共青团组织来接待我们。我们之间言语不通，我们刚学的一点儿俄语根本不够用，只能说一些单词。有的城市的共青团组织还请我们去看话剧。记得有一次看的是《难忘的1919》，我们第一次看到舞台上的列宁和斯大林，感到十分兴奋。没有中文翻译，只能边看边猜。

在伊尔库茨克的候机室里，一位苏联边防军军官会说中国话，他曾在旅顺待过几年。他十分称赞我国人民的勤劳、物产的丰富和气候的适宜。他说，伊尔库茨克附近的土地，除了种苜蓿之类的牧草以外，什么也不能种，无霜期太短了。土地挖掘一公尺以后，底下就是冰块，不能种植粮食作物。

有一次，我们在候机室的餐厅里用餐。程镇球觉得菜淡了点，用英语说了个盐字。一位老服务员听不懂，就去厨房里把所有的佐料全部拿出来，摆了满桌子，可就是恰恰没有盐。弄得全餐厅的人哈哈大笑，有的人都笑出眼泪来了。俄罗斯人的热情好客使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就缩短了。

后来，我虽然多次路过苏联，但是坐的是大型的TU-104喷气客机或是火车，反而没有机会再游历西伯利亚那些城市了。我

特别怀念喀山大学。

2. 从莫斯科到布拉格

我们到达莫斯科的那一天，恰好是 1951 年的最后一天。莫斯科到处灯火辉煌，天上持续下着大雪，铲雪车日夜工作，使得道路上没有积雪。我们住在漂亮的莫斯科大饭店，对面不远就是部长会议大厦。我和郭琨同住一屋。屋里装有旅馆统一的扩音器，从早到晚播放美妙动听的轻音乐。常常播放歌颂莫斯科的一组曲子，是我们大都会唱的，我们就跟着哼唱。夜里我们常常站在窗前，看铲雪车在不停地工作。

我感到好像是在做梦。怎么一下子从上海到了莫斯科？睡在莫斯科大饭店里，兴奋得怎么也不能入睡。耳边传来熟悉的歌曲《我的莫斯科》，歌中描写 28 名勇士为保卫莫斯科，抗击德国侵略者，摧毁了敌人几十辆坦克，但是他们全部英勇牺牲了。我好像看到 1941 年的十月革命节，红军战士们手里握着自动步枪，列队走过红场，接受斯大林的检阅，直接开赴前线。他们中间许多青年人再也没有回到美丽的莫斯科。

我们后来受到苏联团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。那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是米哈伊洛夫同志。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干部，而且多数是在卫国战争中立了功的。记得有一位女书记是游击队的英雄，是卓娅式的人物。她能双手打枪。我们都以钦羡的眼光打量着他们。

我们坐在团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室里，听谢列平书记介绍国际学联及英国学联的情况。他曾经访问过英国。英国学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受的是进步力量的领导，并和其他欧洲的学联一

起建立了国际学联。后来它的领导权被保守党夺过去了。西方的学联纷纷退出了国际学联。英国学联为什么要专门请中国学联派代表团去？据分析，他们希望中国会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，希望中国学联会成为靠近西方、和苏联对抗的力量。他们也知道中国学生运动是很出色的，在中国人民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。

我们正在交谈时，米哈伊洛夫同志突然接到一个电话。他对我们说：“是斯大林同志的电话！”斯大林问他正在做什么？他回答说：“我正在接待中国学生代表团。”斯大林让他向代表团问好，希望代表团在莫斯科生活得好！我们兴奋极了！哦！斯大林同志和团中央的同志直接通话，还问我们代表团好！

我们去会见苏联团中央同志的时候，袁永熙同志特别提醒我们注意：坐椅子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把椅子后腿跷起来，否则容易出洋相。因为有一次，我国团中央代表团到苏联来，和苏联团中央领导同志会见，有个中国代表坐在大沙发椅子上，习惯地坐在椅子的前半部分，把椅子的后腿跷了起来。因为地板很光滑，一不小心，椅子朝后滑去，那位代表就滑到会议大桌子底下了。大家发现突然少了一位中国代表，最后才在大会议桌子底下把他找了出来。当时大家都设法忍住笑。回到旅馆以后，每个人都笑得流出眼泪来了。

另外，袁永熙同志提醒我们千万别喝酒。他说，苏联同志的酒量大得出奇，大家可别在莫斯科出洋相。我们后来看到苏联同志请我们吃饭时，每人面前摆上4个大酒杯，其中有一杯是伏特加，其他是葡萄酒、白兰地、格鲁吉亚酒等等。我们中国同志没有经验，苏联同志问你能喝酒吗？我们有的同志就有礼貌地回答：“我能够喝一点。”那就糟糕了。苏联同志第一杯为中苏人民的友好而干杯，你不能不喝。然后，依次为斯大林干杯，为毛泽东干杯，最后为你这位亲爱的中国同志干杯，你只好乖乖地喝下

去。等你已经感觉天昏地转的时候，苏联同志的酒兴才刚刚开始。

那时的莫斯科充满着生气。到1950年年底，苏联经过艰苦的全民努力，已经使经济恢复到战前的水平，而西欧还处在战后初期的困难之中。我们代表团受到热情的款待。早餐的食物非常丰盛，煮好的鸡蛋放在大盘子里有100个。我们根本吃不下，我和郭琨是小伙子，每个人吃了5个。实际上，吃得过多了。我们那时候年轻，也真能吃。

苏联团中央安排我们参观博物馆，有列宁博物馆和斯大林七十寿辰礼品博物馆等。我最感兴趣的是去参观油画博物馆。记得走进一个大厅，我们都被吓住了。许多人物比真人还大的油画占满整个墙壁。他们好像正在向我们走过来。苏联现实主义的艺术让我们倾倒。

我们更感幸福的是，走进大剧院，坐在第一排，看乌克兰诺娃主演的芭蕾舞《天鹅湖》，还欣赏了柴可夫斯基的歌剧《叶甫根尼·奥涅金》。我最喜欢柴可夫斯基的音乐。我们真的被迷住了，如醉如痴。在戏演完谢幕的时候，苏联的观众，特别是青年人情绪达到几乎疯狂的地步，他们都拥到台前，让演员连续谢幕了几十次，观众的手掌也都拍红了。我们第一次体会到苏联艺术的魅力。

陪同我们的一位年轻的苏联翻译名字叫尤拉。他的中国话说得还可以，只是带点山东腔。有一次，吃过晚饭，我和管平、郭琨三个人兴致勃勃地围着克里姆林宫整整走了一圈，感觉莫斯科也不是非常冷。走回到旅馆的时候，遇到了在门口等我们的尤拉。他很严肃地把我们批评了一通，而且说：“你们如果出了事。那怎么办？”我们当时感到很愕然，在莫斯科难道还不安全吗？

苏联的同志还安排我们代表团去参观列宁格勒。列宁格勒给